

「守望」抑或「逃離」：城市流動兒童 的身分認同與身分建構

張東輝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

在我國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下，流動人口既是「戶籍」農民，又是「編外」市民，隨父母從鄉村來到城市的流動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必然面臨「城市人」還是「農村人」的身分衝突。本文通過對北京市公立學校裏四名流動兒童的個案研究發現：身分認同是一個流變的過程，身為行動者的流動兒童不是戶籍身分的消極接受者，而是身分建構的積極創造者，流動兒童在不同情境下採取不同的認同策略以獲得積極的身分認同和自尊。具體來講，認同「城市人」身分，選擇「守望城市」的流動兒童會採取「拼搏」、「突出城市優勢」、「與老家劃清界限」等手段獲得積極的身分認同；而較認同「農村人」身分，選擇「逃離城市」的流動兒童則通過與城市人抗爭、強化農村人優點等策略尋求正面的身分認同。

關鍵詞：身分建構；身分認同；流動兒童；社會流動

近 30 年來，中國的鄉城流動人口呈急速增長態勢，2010 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最新數據顯示：當前中國流動人口規模已超過 2.45 億人，佔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4）。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隨着流動人口的遷移模式逐漸由「單身外出」轉向「舉家遷移」，城市流動兒童的數量逐年增加。雖然流動兒童的規模和結構還缺乏準確的測算，2013 年全國婦聯課題組發布的研究報告估計：當前全國 0-17 歲流動兒童有 3,581 萬人，比 2005 年增長了 41.37%，其中戶口為農業戶口的流動兒童佔 80.35%，即 2,877 萬人；這些流動兒童高度集中在中東部發達地區，如在北京每 10 個兒童中就有 3 個是流動兒童（全國婦聯課題組，2013，頁 31）。與此同時，流動兒童在流入地長期居住的趨勢明顯，第二代「城市新移民」的問題已經顯現（段成榮、楊舸，2008）。

在中國，由於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流動人口既是「戶籍」農民，又是「編外」市民，或稱「半市民」、「城市化的農民」、「農民工」等。他們像候鳥一樣季節性地往返於城市和農村之間務工或務農，兼具「農民」和「工人」的雙重

身分，並懷着將來告老還鄉的心理預期。然而，隨父輩進城的隨遷子女儘管承襲了父輩的農村戶口，卻大多在城市出生或長大，在城市接受教育進行社會化，已經與「老家」失去聯繫，不具備在「老家」生活所需的各種文化、習俗和知識，甚至連家鄉話都不通。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準城市居民，沒有父輩的戀鄉情結，亦沒有從事農村生產的直接體驗，基本上不可能回到戶口所在地的鄉村生活，社會學者把這些流動兒童稱為「民工第二代」、「城市新市民」或者「城市新生代」，而非短期停留的「城市暫住人口」。對於這些長期居於城市而又不具城市戶籍的流動兒童來說，他們面臨着怎樣的身分認同危機？農村戶籍對他們來說意味着甚麼？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在城市的地位與角色？他們對未來留在城市還是回歸農村又有怎樣的想像？本文通過對流動兒童關於「我是甚麼、不是甚麼」，「我曾經是誰，現在是誰」，「別人認為我是誰」以及「我與他人有甚麼不同」等問題的考察，力圖從根本上探求流動兒童的自我特性和生存意義，並確定他們與身分有關的價值觀念和情感歸屬。

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身分、身分認同與身分建構

經典的身分理論認為，身分是一種常駐不變的「人格狀態」，是賴以確定人們權利與行為能力的基準，人們一旦從社會獲得了某種身分，就意味着他獲得了與這種身分相適應的種種權利（張靜，2006）。在穩定且意義明確的傳統社會，身分是相當穩固的，一旦獲得某種身分，則往往終身不變，因此，身分問題不易為人察覺。然而在全球化、人口頻繁流動和移民潮湧動的現代社會，個體和群體的特質在與其他人或群體空前的互動中正面臨着解構和重構，身分成為現代語境中文化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安東尼·吉登斯，1998）。

一般來說，身分（identity）有兩重涵義，一種是表徵個人所屬社會類群的客觀身分，通常以個人身上所具有某些明確的社會人口特徵為劃分依據，如性別、階層、職業、種族等等；另一種是表徵主觀認同和情感歸屬的身分，當個人試圖追尋、確認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或與特定社會文化的關係時，身分就從一個簡單的社會人口概念轉變為一個社會心理學概念，即「身分認同」（identification）（吳小勇、黃希庭、畢重增、苟娜，2008）。身分的這兩種涵義是密切聯繫並相互影響的，好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身分的形成一方面受到社會地位、角色、職業等外在結構因素影響，另一方面亦是由個體在具體的情境下根據不同參照群體而建構起來。身分建構（identity construction）是個體實現主觀認同、形成自我意識的一種機制（覃明興，2005；鄭慶杰，2010）。由於個體特性的多樣、社會角色的流轉、居住地域的變更及參照群體的複雜性，建構主義認為：個體的身分常常處於不斷變化的過程，具有多重性的特徵。

身分建構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定位再定位」的過程（周曉虹，2008），力圖展示「我是誰」、「我本來是誰」、「我想成為誰」以及「我成為了誰」的全過程。

學界圍繞身分認同的討論主要有兩種理論流派：符號互動理論和社會認同理論（周曉虹，2008；Hogg, Terry, & White, 1995; Howard, 2000）。米德（G. H. Mead）的符號互動學派（symbolic interactionism）認為關於身分的自我概念是在社會互動中形成的，庫利（C. H. Cooley）的「鏡中我」理論即是符號互動的體現。互動中的一方將自我身分的定位和對他者身分的期望賦予對方，對方根據自身的方式作出相應的反應，這種反應又加強了自我對習得而來的身分和利益的定位。符號互動學派強調了有關身分的一個重要問題，即「我」（「我們」、「主體」）與「他」（「他者」、「他們」、「客體」）的關係問題。身分建構是自我認同身分和他人認可身分的統一，必須依賴自我和他者在互動中的共同作用，單方面的努力是不可能實現建構的。身分的自我認同僅僅是身分磋商中的第一步，他者對自我認同身分的認可對於身分的形成更為重要，有他者認可了自我身分，自我身分最終才能得到社會承認，成為社會身分，並由此獲得相應的權利和利益。

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由英國社會心理學家 Tajfel（1982）提出，該理論認為：個體在社會環境中會依據自身和他人的特徵把各種人、物、信息和情景進行歸類處理，即社會範疇化（social categorization），然後個體通過內化某些社會範疇，把「內群體」和「外群體」進行比較，形成對「內群體」的自我意識，並產生內聚力強的群體情感和價值判斷，偏袒「我群」成員，排斥「他群」成員。該理論又認為：每個人都渴望歸屬於能帶來積極正面認同的社會群體，因而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成員可能會採取種種策略，改變他們的群體處境以提高個體自尊，如向優勢群體的社會流動、尋找新的外群體作比較對象、重新界定以前得到否定評價的群體特徵、直接與另一群體進行鬥爭以實現社會變革等等。與符號互動理論相比，社會認同理論更關注個體的社會屬性和個體在身分認同過程中的群體意識，能夠把個人的主體身分建構與宏觀的社會結構聯繫起來。社會認同理論與符號互動理論共同構成了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基於上述身分、身分認同和身分建構的相關理論，本文認為，身分建構是個體在面臨社會類別歸屬時通過主體的積極認知和意義賦予而尋求認同和自我實現的過程。在本研究中，身為行動者的流動兒童不是戶籍身分的消極接受者，而是身分建構的積極創造者，打破了「城市人」和「農村人」二元社會身分的限制，在與自我和他人的互動中力圖改變對「農村人」的污名化和刻板印象，形成了情境化、多元化的身分認同。

流動兒童的身分認同研究

當前城市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已經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早期研究主要圍繞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權利與受教育現狀而展開，即「哪上學」的問題。近年來，隨着中國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逐漸明晰化，尤其是 2003 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門關於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意見的通知〉中明確提出，流動兒童接受義務教育應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公辦中小學為主（俗稱「兩為主」政策），愈來愈多流動兒童得以進入城市公立學校就讀，學界的研究視角和關注點亦從「哪上學」轉向了「如何融入城市和城市學校生活」，社會融入成為研究流動兒童的關鍵詞。部分學者從宏觀社會結構和政策角度出發，認為流動兒童對融入城市生活的意願很高，但是在城、鄉二元結構和戶籍制度的安排下，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構成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流動兒童在諸多方面受到城市社會的抵制或排斥（楊菊華，2009），多數與城市社會有着「隔離性」的融合狀態（王毅杰、史曉浩，2010）。微觀層面的研究則着重分析流動兒童所在的家庭、社區環境、同齡群體和大眾傳媒等外部環境對他們在城市學校就學的不利影響，指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缺失是導致流動人口子女低學業成就和自卑感的主要原因（吳新慧，2004；許傳新，2009；藺秀雲、王碩、張曼雲、周冀，2009）。這些研究雖然對流動兒童的客觀不利處境給予足夠的關注，但落腳點放在社會結構和政策對流動兒童的限制，忽視了流動兒童主動的身分選擇和適應策略。

隨着社會融入研究的深入，愈來愈多學者開始關注流動兒童的主觀身分認同，認為身分認同是社會融入的重要指標。已有研究普遍認為：流動兒童的身分認同陷入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尷尬狀態，成為游離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雙重邊緣人（白文飛、徐玲，2009）；在身分認同上具有模糊和不確定性，既不認為自己是北京人，但又否定自己的農村人身分（沈筱芳，2004）；認為自己是「城裏的孩子」，但「不是上海的孩子」（熊易寒，2009）；在不同社會比較對象面前會啟動不同的社會範疇——在與北京兒童進行比較時啟動「外地人」的社會範疇，而與老家兒童比較時又會以「小北京人」、「半個北京人」等身分自居（羅雲、王海迪，2011）。亦有學者試圖分析流動兒童的身分建構機制，強調流動兒童身為行動主體的能動性和身分認同的流變性，如熊易寒（2009）認為流動兒童會依情境形成進取性認同和防禦性認同，如在公開場合承認自己是「農村孩子」或者「甚麼都不是」（防禦性認同），而在有機會選擇何種身分時，如聊天當中，扮演的則是更突出的或更有價值的身分——「城裏的孩子」（進取性認同）。王毅杰、史秋霞（2008，2010）和段岩娜（2015）認為流動兒童會策略性地選擇與城市底層群體做比較，或彰顯農村田園生活的優勢以追求高自尊，獲得正面的認同，而有些社會經濟地位或學業成績較好的流動兒童在

日常生活中採用新的維度（如是否有錢、是否學習好）來界定農村人或城裏人，期待通過自身的努力和社會流動轉變為未來「真正的城裏人」。

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本文認為：流動兒童的身分認同必須放到具體情境下討論，身分認同和身分選擇因人、因地而異，流動兒童與所處情境的互動過程決定了其身分建構。隨着中國流動兒童在流入地的各項權利逐步完善，流動兒童身分意識的形成受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影響將會愈來愈小，亦會愈來愈不以「戶籍」所在地來判斷自身的身分歸屬，其身分建構的過程將更多地呈現自我選擇和自我認知的特點。為了表示流動兒童身分認同的多元性，本文借鑑美國學者 Berry, Kim, Minde, & Mok (1987) 對身分認同的四分法，依據流動兒童對城市（流入地）和農村（老家）的心理距離和歸屬感的不同，把流動兒童的身分認同分為整合、融入、隔離、邊緣化四種類型（見表一）。

表一：流動兒童身分認同的四維度

	認同農村老家	不認同農村老家
認同城市流入地	是農村人亦是城市人 (整合)	是城市人不是農村人 (融入)
不認同城市流入地	是農村人不是城市人 (隔離)	既不是城市人亦不是農村人 (邊緣化)

以往研究儘管極力推動了關於流動兒童身分認同的思考，但都沒有對流動兒童這四種身分認同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研究框架不夠系統，所得結論大多依據零碎的訪談而非對流動兒童整體生活世界的把握。本文將流動兒童的個體經驗置於主體地位，以北京市四名流動兒童為個案深入他們各自的日常生活，研究他們在生活情境中不同的身分認同和身分選擇，看他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如何建構自我和外部世界，關注的焦點是為甚麼有的流動兒童選擇「做城市裏的守望者」，而有的流動兒童選擇「逃離城市」。

研究場域與個案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討流動兒童的身分認同和身分建構過程。民族志研究中長期深入的特點能夠提供給研究者一種「局內人」的視角，資料的收集均在自然情境下進行，通過對流動兒童、他們的父母（第一代農民工）、老師以及同輩群體所進行的參與式觀察和開放式訪談，研究者能夠較深入了解流動兒童複雜的身分建構過程，從流動兒童的自身體驗與理解出發去發掘他們的內心世界。

研究場域選定北京市海澱區的 X 小學（按：文中所提學校名、班級名、人名均為化名）。首都北京是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心，教育資源豐富，是全國流動人口及流動兒童主要的流入地之一。從 2000 年到 2006 年，北京市流動人口數量從 221 萬增加到 357 萬人，流動兒童數量從 15.5 萬大幅度增加至 50.4 萬。根據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的樣本數據推算，北京每 10 個兒童中就有 3 個是流動兒童（全國婦聯課題組，2013）。海澱區是北京市高等學校和基礎教育資源豐富的一個城區，選擇 X 小學原因有二：（1）X 小學是一家普通公立學校，並非北京教育部門認定的「優質」、「示範」小學，亦不屬於城鄉結合部的薄弱學校；示範學校因為門檻高較少接受流動兒童，薄弱學校裏則流動兒童多達 80% 以上，而 X 小學裏北京本地學生和外地流動兒童差不多各佔一半，異質化的群體間互動較多，有利於本研究的開展。（2）研究者在 X 學校有長期的調研經驗，並曾受聘為該校科研顧問，與校長、教師有過多次合作，建立了較好的關係，為本研究開展田野調查提供了便利條件。

本研究選定的四個個案均是 X 小學五年級學生，兩名男生（劉明明、魏博）和兩名女生（馬小花、韓麗麗）（均為化名）。研究者從 2010 年 3 月到 2011 年 12 月期間到 X 小學進行每周一次的參與式觀察，到班級聽課，參與校內其他活動（如課間操、興趣班等），以熟悉該校的學校生活和日常儀式。在觀察中，研究者與多名流動兒童密切接觸、談話，並最終選定這四名流動兒童為代表個案進行深入研究。異質性是個案選擇過程中的主要依據，這四名流動兒童來自不同省份，其家庭經濟狀況、在北京居住時間和父母職業亦各有不同，具體情況見表二。

表二：四個個案流動兒童的背景資料

姓名	性別	年齡	來京時間	老家	父/母職業
馬小花	女	9	生於北京	江西	貨車司機/清潔工
魏博	男	10	生於北京	陝西	水果販
劉明明	男	10	三年級	河南	收廢品/門衛
韓麗麗	女	11	二年級	河南	水電工/宿舍管理員

調研中如何與流動兒童及其家庭取得聯繫並建立信任是十分困難的事。當研究者起初進入班級進行觀察時，學生們均表現得很拘謹，回答問題的語言亦很「官方」。隨着研究者參與式觀察的次數增多，他們開始習慣研究者的存在，常常主動與研究者聊天，於是在此基礎上開展了深入訪談。通過流動兒童自己的陳述和回憶探尋了他們的內心世界，了解他們進行自我定位和社會比較的心理過程。對流動兒童家長的訪談是在老師幫助下進行，由於這些家長多是在北京從事工作時間長的體力勞動，研究者電話預約多次才能得以面談。與家長訪談主要了解到流動兒童學校以外的生活世界，包括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期望、進城前的背景和對未來在北京

居住的計劃等等。家長訪談為本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背景資料，使流動兒童與城市的關係變得鮮活。除此以外，研究者還在學校裏對流動兒童的老師和同學做了非正式的訪談，更加立體和全方位地了解到流動兒童所處的學校環境和師生、生生互動情況，獲得了大量真實可信的數據和資料。

研究發現：「我是誰？」和「我想成為誰？」

在中國嚴格的戶籍制度所造成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影響下，城市和農村被人為地割裂開來，「城市人」和「農村人」的區分乃至對立成為了這種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必然產物。在這種背景下，流動兒童隨父母進入城市不僅跨越了城鄉的地域邊界，更面臨戶籍身分與社會心理身分的錯位。也許年幼的兒童對戶籍內涵還不敏感，但從入學那一刻開始，各項學校政策和規定即把戶籍身分清晰地擺在了流動兒童面前。即使近年的「兩為主」政策給流動兒童帶來了「同城待遇」的期望，在各類教育政策文本中他們依然被稱為「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入學所需手續比北京戶籍孩子要複雜得多，可供選擇的學校亦極為有限，有些流動兒童（如非獨生子女）更是直接被排除在外。在現行的學校制度安排下，進入城市公立學校就讀的流動兒童無時無刻不感覺到自己的「異類」身分，在老師的眼中口中他們是「外地的孩子」，而在與北京本地同學朝夕相處的過程中，流動兒童更直接地感受到自己的不同。在與周圍環境、與他者的互動過程中，流動兒童的身分認同面臨着不斷的解構和重構。「我是誰」、「我們與他們有甚麼不同」、「為甚麼我們和他們不同」構成了流動兒童在成長過程中不斷追問的問題。

對於「我是誰」，流動兒童多半從與「他者」的互動中、從「他者」對自身的態度和反應中獲得，而「我想成為誰」則代表着他們對自身身分的真實態度。相比外界強加的身分意識，「我想成為誰」更能體現出流動兒童身為身分建構行為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對研究流動兒童的身分建構更有意義。本節就四位流動兒童關於「我是誰」和「我想成為誰」的困境展開討論，試圖通過流動兒童對「城市人」和「農村人」身分內涵的不同認知來探究其對自我當前與未來身分的建構，並分析四位流動兒童為達到各自的期望身分所採取的不同身分認同策略。研究發現：四位流動兒童中有三人認同「城市人」的身分，儘管意識到自己不是北京戶口，卻採取各種方式、態度努力向城市人靠近，標榜自己是「城市人」；另一人卻不留戀地撕掉「城市人」的面紗，承認自己就是「農村人」，並聲稱最終將回歸鄉土。

馬小花——「我可以跟他們學的一樣好」

馬小花從小出生於北京，是家裏第二個孩子。她的媽媽是飯店的洗碗工，爸爸是

貨車司機。由於在北京租房地方太小，姐姐被送回老家學習，所以她是父母身邊唯一的孩子。在學校裏，馬小花的學習成績一直不錯。因為她聰明好學，入學時本來其他外地家長要交的贊助費都給免了。她媽媽提起這一點來很驕傲：

我們家老二從小就愛看書，小時候看她姐姐背唐詩，她姐姐會背了，她就會背了。從小甚麼都不用管，收拾書包，洗襪子甚麼的都是她自己來。進 X 小學時候之前要考一次試，我們家老二嗖嗖十幾分鐘就答完了，旁邊那個孩子好像不會似的，才寫幾道題，陳主任就是看上這個了，後來就給我們打電話，讓我們入學了。（馬小花媽媽訪談，2010 年 5 月 12 日）

由於馬小花的成績很好，在班裏的人緣亦很好，他的好朋友都是班裏的好學生。老師們都很喜歡馬小花，有甚麼事情都會讓馬小花幫忙。在學生們眼裏，老師讓某個學生幫忙，就表示老師喜歡這個學生，看重這個學生。老師們不經意的指派，在學生們的世界裏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由於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成績不好、紀律差的流動兒童是「理所應當」，所以像馬小花這樣努力學習、各方面表現優異的流動兒童，大家反而會因她「流動」的身分對她另眼相看。馬小花的老師這樣評價她：

馬小花不錯，自理能力很強，他爸媽文化程度都不高，孩子確實不錯，你都不用說她，她自己知道自己該幹甚麼，比好些城裏孩子都強。（馬小花班主任訪談，2010 年 3 月 7 日）

馬小花對自己的學習非常有信心，她將來想上 B 中學，這所中學是 H 區的重點中學，她是四位流動兒童中唯一提出想上 B 中學的學生。而且她想通過「推優」這種優中選優的方法上 B 中學，更重要的是，她對自己信心十足。儘管她知道自己並沒有北京戶口，但她覺得北京戶口對她來說並「不重要」，因為她認為她和北京的孩子「沒甚麼區別啊，我跟他們是一樣的啊」，「我可以跟他們學的一樣好」（馬小花訪談，2010 年 6 月 15 日，下同）。她有自己的驕傲，「我付出雙倍的努力，在學習英語方面，像宋兆霆英語學的快，我付出的努力雖然比他多，但我能和他在一樣的水平上」，她認為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別人達到一樣的水平，她感到非常驕傲。儘管她知道可能將來不能在北京讀高中，但她說「上完初中就回家上高中，然後再考大學，再回來做點甚麼工作」。馬小花覺得自己屬於北京，不想回老家，即使放假，她都不願意回去。「媽，你們回去吧，我回老家不適應」，每當媽媽想帶她回老家的時候，她都這樣對媽媽說。馬小花從小出生於北京，成長在北京，既聽不懂亦不會講老家的方言，無論是語言交流還是生活環境，她都對老家感覺到明顯的不適應。

在馬小花看來，姐姐不能繼續在北京上學，爸媽被迫「拋下」自己拼命賺錢養家都是家裏條件不好造成的，因此，她很羨慕「家庭條件好的」學生，「因為家裏有錢，

東西甚麼的都挺全的」。如果覺得家裏條件好一點，姐姐就不用回老家上學了。父母的艱辛她看在眼裏，自己能做的只能是努力學習，改變命運。

因此，馬小花認識到她與城市孩子在社會經濟地位方面的差距，亦清楚知道自己的戶口在外地，但是在分數至上的城市學校裏，學習優秀的馬小花並不覺得失落，相反她在城市裏找到了歸屬感。雖然她知道戶口會限制外地人在北京的求學機會，但是小學升初中的「推優」政策給了她留在城市讀書的機會，而且若能憑藉自己的優秀成績升入初中而不僅僅是戶口使然讓她更有尊嚴和優越感，讓城市的老師和同學都對她另眼相看。即使高中不能在北京上，她只覺得是短暫的離開，高考的通道必然會讓她重返城市，最終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找到工作，成為真正的「城市人」。因而，馬小花不認為自己比城裏的孩子差，當前的處境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的，在身分認同上她以想像中的未來身分來緩解當前不利群體身分對自己造成的影響。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當處於不利群體的成員認可優勢群體的地位，同時亦相信存在一定的社會通道、機會能夠使其進入到優勢群體當中時，他們在言行上會盡量向優勢群體身分（如城市人、優等生）靠攏，在身分認同上表現為「融入」的傾向，即認為自己是城市人不是農村人。用馬小花的話來說：「我跟他們是一樣的」，「我可以跟他們學的一樣好」。

劉明明——「老家那邊和北京這邊」

劉明明是家裏的獨生子，個子很高，長得胖乎乎的。自父母離開老家來北京打工後，劉明明跟奶奶在老家生活了兩年，因而跟奶奶感情很深，至今每周都給奶奶打電話。他是讀到三年級時被父母從老家的學校轉到 X 小學的，如今已經在新學校度過了兩個寒暑。劉明明的爸爸媽媽學歷都不高，都是小學畢業，他們兩人在小區的物業管理處工作，媽媽做門衛，爸爸收廢品；他們努力地在城市奮鬥，一家三口如今「蝸居」在一幢居民樓的地下室，洗漱、做飯、睡覺全都在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間裏進行。

來到 X 小學後，劉明明的成績一直不好，只有數學勉強跟得上：

要交也只交數學作業，英語和語文都不交，英語也就是幾分。（劉明明班主任訪談，2011 年 9 月 17 日）

劉明明的班主任在接受訪談時向我說明了他偏科很嚴重的情況。至於英語成績為甚麼不好，明明媽說：

老家和這邊用的教材不一樣，老家那邊沒開英語課，他到這邊才學英語，跟不上。（劉明明媽媽訪談，2011 年 4 月 3 日）

同學們還給他起了個綽號——「劉明明牌大峽谷」。原來班裏為了獎勵表現好的同學，就在牆上貼了一張大紙，每個人都有一欄，表現好就會得到一個「小腳丫」，表現愈好，小腳丫就愈多，高度就愈高；劉明明旁邊兩個同學的「小腳丫」都很多，而劉明明這一系列卻一個「小腳丫」都沒有，顯得像兩個高山之間的峽谷，所以同學們叫它「劉明明牌大峽谷」。在學校裏，學生們會自動分為「好學生」和「差學生」，學習成績上的好壞影響着一個學生在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學生不僅能贏得老師的青睞，在同學中亦很有面子。劉明明的成績不好，成為了他進入城市兒童圈子的最大阻礙。

外表看起來敦厚老實的劉明明，在班裏沒有甚麼要好的朋友，他自認為的唯一一個好朋友（該學生在班級排名第一或第二，是公認的「好學生」）在跟我說起他和劉明明的關係時，亦僅僅用「還行吧」三個字輕描淡寫地回答。在談到他沒有朋友的原因時，他們班的一個女同學說：「因為他身上又髒又臭，學習不好，還不交作業」（田野筆記，2010年6月7日）。連老師都知道同學們故意疏遠他的事情：

班裏的同學都不願意跟他玩，同學們都……說得不好聽點，都排擠他，上次男生們一塊兒照相，就他自己一個人在旁邊站着，有的同學還說他懶豬啊，蠢豬啊……自從我當班主任之後，我就跟班裏的同學說，同學之間要互相尊重，情況就好點，表面上好像還行，過得去，但其實大家還是疏遠他。（劉明明班主任訪談，2011年9月17日）

談到同學們對他的辱罵，劉明明表現得非常激動，臉漲的通紅，仿佛要大打出手：「他們總欺負我」，「就像幫派似的」（劉明明訪談，2011年3月9日，下同）。相反他在農村學校有一大群鐵哥們，「我們在農村可自由了，同學們都是一個村的，到處跑着玩，可開心了」。

儘管劉明明對北京同學間這種不友善的行為很氣憤，但卻沒有影響他對北京的喜愛，當研究者問他更喜歡在老家還是在北京時，他很明確地說「當然是北京啦」。北京固然有他不喜歡的地方，比如交通擁擠、尾氣污染等，但「瑕不掩瑜」，在與他的談話中，隨時隨地都透露出他對北京的喜愛和對「北京人」這種身分的嚮往，「北京的教學設施好，還有籃球場，還能上體育課，在老家啥都沒有，就自己玩」，「在北京上學好，教育質量好，在老家老師都不管學生」。劉明明還將老家的孩子與北京的孩子作對比，突出他更喜歡北京，「老家那邊打架的太多了，北京的雖然也會打架，但不會像老家那樣的」。在談到理想時，劉明明說他將來想當「將軍，或者軍長」，他知道學歷高才能達成那樣的理想，而自己學習成績並不好，但他仍然為自己的這個理想感到驕傲。「在老家，田裏幹活太費力氣了，十幾畝地呢」。劉明明的期望表達了流動兒童對脫離農村生活、向城市社會流動的渴望。

隨着居住地點改變，流動兒童眼前的世界由一望無際的農田變成鱗次櫛比的樓宇，瞬間的改變令他們應接不暇，對於剛來城市的流動兒童來說，城市無疑是繁華美好的象徵，老家的一切變得不值一提。與馬小花不同，劉明明從小生長在農村，身上無疑帶着農村孩子的特點，各方面都不適應城市學校的要求，這亦造成了他初到城市不被接納的原因。人類學者奧格布（Ogbu, 1991）在分析美國移民後代的文化融入時提出了「雙重參考框架」（dual reference framework）的概念，即儘管移民兒童在流入地面臨貧困和歧視，但他們不把自己與本地學生相比，而是傾向於把流入地的教育條件和待遇與家鄉作比較，從而獲得較高的滿足感。從劉明明的案例可以看到，儘管他的學習成績不好，在班級裏受到同學冷落和排擠，但他常常把自己的處境同剛剛脫離的農村環境相比，在身分認同上表現出「城鄉整合」的傾向，一方面時時提及自己的老家和農村人身分，與老家的人（如奶奶、同村夥伴等）保持密切聯繫；另一方面農村學校基本設施的匱乏又使他對當前的「城裏人」生活與地位感到滿足。

魏博——「反正我是在北京出生的」

魏博是 X 小學五年級二班的學生，他在北京出生，一直跟隨父母在北京生活。魏博的爸媽來北京已十多年，利用多年打工的積蓄，二人在 X 學校外經營水果攤，生意很好。魏博在陝西的老家現在只剩下爺爺奶奶，其他親戚如大伯和叔叔都全家搬了來北京。相比本研究中其他流動兒童家庭，魏博家在北京居住時間較長，經濟條件亦不錯，他父母平日都很捨得在魏博身上花錢，給他買了電腦，還報了每個星期 700 塊錢的託管班，連平時用的文具都是最好的，比如他的一支筆都要 12 塊錢，「這樣的筆在我們班只有三個人有，用完了媽媽就會給我買」（魏博訪談，2011 年 4 月 11 日）。這樣優越的條件使魏博覺得自己在物質生活水平上和城裏的孩子是一樣的。

儘管物質水平並不比城裏的孩子差，甚至還高於有些城裏的孩子，但是魏博的學習成績並不怎麼好，每次在班裏總是「倒數第一或倒數第二」（魏博同學訪談，2011 年 4 月 5 日）。班主任老師亦認為魏博是一個「智力有問題」的學生：

他媽媽是賣水果的，整天也不管他，你想能和本地的孩子比嗎？給他媽媽打電話他也不來學校。（魏博班主任訪談，2011 年 4 月 3 日）

儘管在同學和老師眼中魏博是來自低文化階層家庭的差生，他自己卻不認為與北京孩子有甚麼不一樣。他對自己學習成績的估計遠遠高於現實的名次，「我們班 29 人，我在我們班能排 20 左右吧」。當研究者問到寫作業情況時，他說，「我媽經常檢查我的作業，因為我爸經常不在家，我媽上了大學，那些題她都會做」（魏博訪談，2011 年 4 月 11 日）。事實上魏博的媽媽是在學校附近賣水果的小商販，根本沒能力

亦沒時間輔導他。顯然，他在力圖掩飾父母的外地人打工身分，使人以為他的家庭和城市裏的普通上班族家庭一樣。

在訪談過程中，魏博堅定地表示不想回老家，而且和老家沒有太深感情，又不經常打電話回老家問候長輩。根據魏博自己的描述，自出生之後，他僅回過三次老家，即使回老家他基本上亦不講話，因為他根本聽不懂方言：

問：「那老家有甚麼好的地方嗎？」

答：「誰想回老家啊！」

問：「你的戶口是在哪兒啊？」

答：「反正我是在北京出生的！」（魏博訪談，2011年2月1日）

問：「你跟老家的感情深嗎？」

答：「一般吧，我是在北京出生的，從小就在這邊上學。」（魏博訪談，2011年3月5日）

很多流動兒童都曾有過「留守」的經歷，對農村的鄉土生活有親身體會，因而對農村的認同感強烈，如劉明明。然而魏博在城市裏出生和長大，對鄉土社會一無所知，「反正我是在北京出生的」，言外之意，他覺得在北京出生的就是北京人，跟北京的孩子沒有甚麼區別。在巨大的城鄉差距面前，魏博不為自己對老家的一無所知感到尷尬，反而一種優越感油然而生，他的認同邏輯似乎是「我是在城裏出生的，所以我是城裏人」。與馬小花在城市學校的境遇不同，魏博因為學業成績不佳而無法通過升學這條社會流動通道成為「城裏人」，只好轉向「出生在北京」、「物質條件不比北京的孩子差」等比較維度來彰顯自己的城市人身分，並且通過「對老家不熟」、「不會說方言」、「我一上學就在北京」、「我媽媽上了大學」等話語／謊言來刻意與農村人身分劃清界限，從而達到心理上脫離當前所屬流動兒童群體的目的，維持表面的自尊或面子。然而，當魏博把「農村人」歸於「他群體」的同時，並沒有獲得自己期望的「我群體」——「城市人」的認可，在老師和同學眼中，他依然是「外地的孩子」，「父母是賣水果的」，「學習不好」。在某種程度上，魏博的身分認同處在既不認可自己是農村人亦沒能融入城市裏的「邊緣化」狀態。

韓麗麗——「我是河南人」

與劉明明一樣，韓麗麗是從農村老家的學校中途轉到X學校的。「轉學有個考試，我考的一塌糊塗，因為題我都不會做，我在老家也沒學過」（韓麗麗訪談，2011年4月19日，下同）。韓麗麗家共有4口人，媽媽是北京一所職業技術學校的宿舍管理員，爸爸是該校的水電工，一個哥哥已經輟學，現在全家都居住在這所學校的宿舍裏。

「我哥已經不上學了，所以他們就把希望都放在我身上了，給我很大壓力。我回家必須得先寫完作業，才能吃飯，不寫完作業不讓吃飯」。

儘管父母對韓麗麗抱有很高的期望，可是她自己並不喜歡學習，「我最不喜歡拿筆」，「我就不明白，為甚麼非得學習呢，幹點別的工作不也行嗎，我覺得學習挺沒意思的」。她的父母和親戚卻讓她用北京人的標準要求自己，以期出人頭地，連老家話都不讓她說。「我二叔說，在北京這麼長時間了，再說老家話就不太好」。韓麗麗雖然不喜歡學習，但她羨慕學習好的學生，「因為老師喜歡學習好的學生」。韓麗麗好動，喜歡交朋友，非常在意自己與老師同學的人際關係，但因為她學習不好，老師和同學似乎不喜歡她。各科目當中她最擅長的就是體育，「我想當體育委員，我長跑最厲害，還參加校隊訓練呢，但是老師沒選我，可能因為我和老師的關係不好。有些北京本地的小孩可能拍老師馬屁了」。

韓麗麗已經在北京生活了三年，但她並不覺得自己是北京人：「我覺得我是河南人，因為我覺得北京這邊沒甚麼意思，像我在老家還能和我舅舅的孩子一塊玩，在這邊都沒人和我玩」。實際上，韓麗麗對老家的感情很深，她承認北京的學校比老家的好，但是並不像劉明明一樣喜歡北京。韓麗麗說：「如果能把北京這麼好的學校放在老家就更好了，我還是喜歡老家，我舅舅家有個小孩兒，跟我差不多大，我跟她一塊兒玩，她還有同學，也能把她的同學介紹給我」。

對老家的深厚感情加上在北京城市學校裏所受的冷遇，韓麗麗常常把自己與北京人對立起來，突顯自己對農村身分的認同：

就那個趙琪，我們班最胖的那個，帶粉色髮卡的那個，她就是北京的。她這個人啞，最喜歡講別人，還說老師。有一次做題，她改了好幾遍都沒改好，商老師就說她，她回到座位上就小聲嘀咕，那是在罵老師呢。

有一次，我倆鬧着玩，玩着玩着她就急了，說我，你這個「外地人」怎麼樣怎麼樣的。我就說你這個肥豬。（田野筆記，2011年3月10日）

當流動兒童意識到在城市空間內自己所屬群體的邊緣地位，且認為現實生活中缺乏或沒有充足的通道實現流動時，則可能會更加強調自身的農村人身分，並通過誇大農村人的優點和城市人的弱點來降低城市群體成員身分（他群）的優勢地位，增強農村人（我群）的優越感。這裏韓麗麗放大了個別城市兒童的短處，把它們跟農村人的長處相比，如城市孩子「拍馬屁」，「喜歡說別人」，「我學習不如他們，但他們體育沒我好，不愛勞動」等，借此將城市成員群體的整體形象放到比農村群體成員低下的水平線上。對韓麗麗來說，這是一種變相的身分提升的途徑。

在中國教育當前「學術至上」的評價體制下，讀書、升學幾乎是流動兒童「出人頭地」的唯一機會。愛運動、愛交際的韓麗麗認識到自己的學業成績比不上城裏的

同學，不能像馬小花一樣成為老師的「寵兒」，她的體育特長亦不被學校和老師認可，加上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所面臨的機會結構，使她認識到自己即使付出更多的努力都未必能夠取得與城市同學同等的地位，從而產生了強烈的不公正感、被剝奪感和不滿感：

問：「你知道沒有北京戶口只能在北京上到初中嗎？」

答：「知道啊，沒辦法，就上到初中，高中就回去念，我就怕我到時候連老家話也不會說了。你說北京人和外地人有甚麼不一樣的，不都是人嗎，為啥北京人就能幹這幹那的，真不公平。」（韓麗麗訪談，2011年4月19日）

與前面三位流動兒童相比，韓麗麗是唯一一位不渴望留在城市的孩子。儘管和劉明明一樣來自農村，但她更看重個人感受，不像劉明明那樣被城市的優越條件所吸引，更不像魏博那樣極力摒棄農村身分向城裏人靠攏。相反，韓麗麗採取了抗爭的社會認同方式，抗議身分政治中蘊含的不平等，她以農村身分為傲，認為自己就是「河南人」，形成了隔離的身分認同（認為自己是農村人不是城裏人）。然而，在當前城市對農村的絕對優勢面前，這樣選擇的結果是韓麗麗只好「大度地」退出與城市兒童的競爭，逃離城市，回歸農村。

討論與結論

王毅杰、史秋霞（2010）認為流動兒童的身分認同並非城、鄉二元分野中非此即彼的線性關係，而是具有多元、模糊及動態的特徵。本文通過對在北京市一所公立學校就讀的四名流動兒童的個案研究發現，戶籍的限制並沒有成為流動兒童判定自身身分的決定因素，流動兒童抗拒簡單的「農村人」、「城市人」標籤，在身分認同上呈現出自我選擇的主動性特點。在個體與所處具體情境的互動當中，上述四位流動兒童分別形成了對城市（流入地）和農村（老家）不同的心理距離和歸屬感，具體可分為融入（只認同城市）、隔離（只認同農村）、整合（認同兩者）、邊緣化（兩者都不認同）四種類型。

本文贊同熊易寒（2009）的觀點，認為流動兒童的早期生活經歷對身分認同具有重要作用，童年的經歷、在城市生活時間的長短對流動兒童的身分認同有重要影響。從小生活在城市，受城市文化薰陶，鮮有鄉土記憶，但戶籍上仍屬「農村人」身分的流動兒童，對老家基本沒有甚麼感情，更習慣城市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如魏博和馬小花；他們在主觀上對城市身分非常認同，客觀上進入城市的社會流動通道卻異常狹窄，結果或是成功融入城市（如馬小花）或是面臨邊緣化的危機（如魏博）。相比之下，大部分中途來到城市的流動兒童更熟悉農村老家的生活，如劉明明和韓麗麗，

他們不排斥自己的農村人身分，同時又被城市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期望得城市接納，然而在巨大的城鄉差距和社會不公面前，或者表現為消極的抗爭和逃避（如韓麗麗），或者表現為自我安慰（如劉明明）。

不管流動兒童在城市的個體經歷如何，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使得他們普遍面臨身為社會底層弱勢群體的身分認同挑戰。然而，社會認同理論認為：每個人都渴望歸屬於能帶來積極正面認同的社會群體，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成員常常採取種種策略改變他們的群體處境以提高個體自尊（羅雲、王海迪，2011）。就本文中的四個流動兒童來說，他們在主觀上採取不同的認同策略以獲得積極的社會認同和自尊。認同「城市人」身分，選擇「守望城市」的流動兒童採取「拼搏」（馬小花）、「突出城市優勢」（劉明明）、「與老家劃清界限」（魏博）等手段獲得積極的社會認同；而較認同「農村人」身分，選擇逃離城市的流動兒童（韓麗麗）則通過與城市人抗爭、強調農村人的優點等方式尋求積極的身分認同。值得注意的是流動兒童的身分建構是一個流變的過程，未走出校門的流動兒童可能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和憧憬，對戶籍身分的限制亦沒有深刻的認識，然而隨着年齡增長，隨着在城市求學、就業的諸多不順，可能會形成更消極、對抗性的身分認同，不利於城市社會的穩定。

雖然近些年來的國家政策力圖給予流動人口子女「同城待遇」，但是戶籍制度依然成為流動兒童在城市升學、就業的「壁壘」，阻礙他們融入城市。在當前戶籍制度不變的前提下，流動兒童向城市身分轉化的渠道惟有通過學業成績，精英選拔一向是信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中國社會最合理合法的向上流動通道。學業成績亦是決定流動兒童能否為城市學校、老師和同學接納的最重要因素。流動兒童的父母普遍對孩子抱有較高的教育期望，希望孩子能好好學習，將來找到一份好工作，過上城市人的生活。然而現實中的馬小花少之又少。城鄉教育資源不平衡的結構性限制以及家庭文化資本的缺失，使得大多數流動兒童在城市學校無法取得滿意的學業成績，無力背負全家向上流動的壓力。教育公平的衡量之一是教育機會均等，當流動兒童被忽略他們貧乏而受限的教育機會和資源，卻要求與城市兒童取得相同或更優異的學業成績，他們只能「輸在起跑線上」，學校成了布迪厄（P. Bourdieu）所言的「社會再生產」的媒介，而不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工具。只有拓寬社會流動通道，才能從根本上幫助流動兒童融入城市，形成積極正面的歸屬感，促進社會融合。

鳴謝

本研究的開展得到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蘇靜巍同學的大力協助，特此感謝。本論文初稿曾於 2012 年 10 月 24 日在北京師範大學—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第四屆國際教育研討會上宣讀。本研究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基金「我國城市流動兒童的自我身分建構研究」（項目編號：09YJC880100）的課題資助。

參考文獻

- 王毅杰、史秋霞（2008）。〈參照群體下流動兒童的身份意識及成因〉。《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7卷第3期，頁53-57。
- 王毅杰、史秋霞（2010）。〈流動兒童社會認同的策略性選擇〉。《社會科學研究》，第1期，頁90-96。
- 王毅杰、史曉浩（2010）。〈流動兒童與城市社會融合：理論與現實〉。《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0卷第2期，頁97-103。
- 白文飛、徐玲（2009）。〈流動兒童社會融合的身份認同問題研究——以北京市為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2期，頁18-25。
- 全國婦聯課題組（2013）。〈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中國婦運》，第6期，頁30-34。
- 安東尼·吉登斯（著），趙旭東、方文、王銘銘（譯）（1998）。《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中國：三聯書店。
- 吳小勇、黃希庭、畢重增、苟娜（2008）。〈身份及其相關研究進展〉。《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3期，頁8-13。
- 吳新慧（2004）。〈關注流動人口子女的社會融入狀況——“社會排斥”的視角〉。《社會》，第9期，頁10-12。
- 沈筱芳（2004）。《“第二代邊緣人”與城市的融合——對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的心理分析》（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人民大學，北京，中國。
- 周曉虹（2008）。〈認同理論：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分析路徑〉。《社會科學》，第4期，頁46-53。
- 段成榮、楊舸（2008）。〈我國流動兒童最新狀況——基於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的分析〉。《人口學刊》，第6期，頁23-31。
- 段岩娜（2015）。〈學校場域中流動少年兒童的身份建構與認同——以昆明市的調查為例〉。《雲南社會科學》，第1期，頁160-165。
-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4）。《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4》。北京，中國：中國人口出版社。
- 張靜（2006）。《身份認同研究：觀念、態度、理據》。上海，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
- 許傳新（2009）。〈流動人口子女公立學校適應性及影響因素研究〉。《青年研究》，第3期，頁18-26。
- 覃明興（2005）。〈移民的身份建構研究〉。《浙江社會科學》，第1期，頁88-93、94。
- 楊菊華（2009）。〈從隔離、選擇融入到融合：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問題的理論思考〉。《人口研究》，第33卷第1期，頁17-29。
- 熊易寒（2009）。〈城市化的孩子：農民工子女的城鄉認知與身份意識〉。《中國農村觀察》，第2期，頁2-11、45。
- 鄭慶杰（2010）。〈飄移之間：大學生村官的身份建構與認同〉。《青年研究》，第5期，頁45-54。

- 羅雲、王海迪 (2011)。〈城市公立學校中流動兒童的社會認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刊》，第 2 期，頁 106-116。
- 藺秀雲、王碩、張曼雲、周冀 (2009)。〈流動兒童學業表現的影響因素——從教育期望、教育投入和學習投入角度分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5 期，頁 41-47。
- Berry, J. W., Kim, U., Minde, T., & Mok, D. (1987). Comparative studies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1(3), 491-511. doi: 10.2307/2546607
- Hogg, M. A., Terry, D. J., & White, K. M. (1995). A tale of two theories: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identity theory with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8(4), 255-269.
- Howard, J. A. (2000).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367-393. doi: 10.1146/annurev.soc.26.1.367
- Ogbu, J. U. (1991). Immigrant and involuntary minorit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 A. Gibson & J. U. Ogbu (Eds.), *Minority status and school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mmigrant and involuntary minorities* (pp. 3-33). New York, NY: Garland.
- 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 1-39. doi: 10.1146/annurev.ps.33.020182.000245

“Anticipation” or “Flee”: The Identity Form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Urban China

Donghui ZHANG

Abstract

Under the urban-rural dualistic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migrants residing in urban cities retain their status of peasants b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igrant children who come to cities with their parents are inevitably confronted with identity crisis in their growing-up process. Based on case studies with four migrant children in a Beijing public school, it was found that identity formation is a fluid proces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does not prevent these migrant children from identifying as “urban residents.” Instead, these migrant children adopt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o acquire positive social status and self-esteem. Specifically, children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urbanites anticipate joining the city through “working hard,” “using rural life as a reference point,” and “estranging themselves from their rural origin,” whereas children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rural people tend to highlight the strengths of rural people and to flee from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ir urban peers.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identity 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social mobility